

理性问题的实践解答

沈湘平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在理解和使用理性的历史中, 一直存在着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普遍理性与特殊理性、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矛盾或争论。在马克思的实践视阈中, 我们可以完成对理性问题的解答: 理性是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试图且有可能使自己的行为既合乎规则又合乎目的的能力; 它是理性的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含义的统一, 是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普遍理性与特殊理性、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统一。

关键词: 理性、实践、问题、解答

中图分类号: B1 **文献标识码:** A

一、“理性”的问题

众所周知, 消解理性是后现代哲学的突出特征, 福柯则是后现代哲学家的杰出代表。然而, 就是福柯说出了如下这段很具代表性和发人深思的话: “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 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究竟是什么? 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 它的局限是什么? 危险是什么?”^{[1](p47)} 福柯的这一结论表明: 首先, 虽然他坚持后现代主义一贯从消极方面考察理性的传统, 但他却毫不含糊地明确了理性问题在哲学, 尤其是在西方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人们可以为理性辩护或对之进行批判, 但理性却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其次, 无论是为理性辩护, 还是对理性进行批判, 首要的是弄明白究竟“什么是理性”。再次, 理性具有极其复杂的涵义, 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 “什么是理性”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获得解答。所以, 我们追问“什么是理性”就不得不回到哲学史或理性解释史本身。而一当我们进行这种考古研究时, 就将发现: “西方哲学史不折不扣地是关于理解和使用理性的互相冲突的解释史”。^{[2](p1)}

(一) 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的争论

“理性”最初源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 *Logos* 和阿拉克萨哥拉的 *Nous* 两个概念。赫拉克利特的 *Logos* 是决定一切生亡存灭, 协调一切人和事物的共同的法则。但它不为多数人所认识, 所以, 对于人而言, 最高的理性就表现为认识 *Logos* 并按照它行事。阿拉克萨哥拉的 *Nous* 是无处不在而又不与万物混存的精神性的东西(心灵)。它决定万物并保证着它们的秩序, 它既是宇宙的理性, 也是人的理性成分。可见, 理性从一开始就有两层含义: 理性首先是一种使世界和人的存在成为可能的超越理智和客观性“规则”, 即宇宙理性; 其次才是人的理性, 即人所具有的认识和遵守规则的精神能力。考虑到整个理性哲学史考察的连续性, 我们将理性的两层含义分别称之为客观理性(或存在理性)和主观理性。显然, 在“理性”诞生时, 客观理性是先于和高于主观理性的, 人的主观理性不过是分有和接受了客观理性。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理性哲学的真正奠基人，他们以古典的方式阐述了理性作为精神能力，即主观理性的方面。认为理性是达到真理的手段和途径。三位大师的主观理性研究是近代以认识论为基础的理性主义的源头。但是，他们的主观理性观与近代西方建构于主客体关系之上的认识论理性观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他们理解的理性不是与感性、知性等量齐观的心灵能力，它是知识和道德的共同基础，是人和万物得以显现和存在的中介（途径）。其次，最为重要的是，从理性的来源来看，他们都将之归为至上的神，人只是分有了神的理性。

从理性的来源看，古希腊的理性观是一种客观理性观。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它在宇宙中寻找理性”，理性“并不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最初的最重要的属性，而是存在本身的属性。存在本身以这种方式而成为全体，表现为全体，即人类理性被极其适当地设想为这种存在的合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被设想为同客观的全体相对应而认识自己的自我意识。”^{[3](p29-25)}主观理性以其从属于超越的客观（存在）理性的方式达到了两者的统一。当然，客观理性观的形而上学性和神秘性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理性观后来经奥古斯丁直至托马斯·阿奎那的改造，宇宙理性变成了人格化了的上帝的理性，上帝创造人，也赋予了人以理性。从此客观理性的命运就和上帝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14 世纪英国唯名论的兴盛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使得理性开始与神、上帝脱钩，而与科学观察、实验、预见等人的主体经验联系起来。笛卡尔则明确认为理性是人人具有的一种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人通过理性的怀疑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他在人的思维活动中，而不是在人之外的上帝、实体中探求理性。“我”和“我”的理性成为了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和确定性标准。这样就将理性建基于认识主体及其自我意识，认识论的主观理性成为了理性的全部。这种理性观使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这种主体地位既是相对于上帝的，也是相对于自然的，它使西方走出蒙昧的基督教时代，开辟了一个科学理性的时代。客观理性以反神学的名义至少在知识的领域被遗弃了。康德更加全面地阐述了主观理性，他认为不光是知识，而且道德、审美，甚至宗教等人类活动的最终条件和根据都是理性——自主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纯粹理性。“康德从根本上把理性定义为制定法则的能力，即人的制定法则并且整理思想与此相应的行为的能力。”^{[4](p126)}作为纯粹的自主性，人的理性既为自然立法，也为人自身立法；它既是最高的立法者，也是最高的裁判者。在这里，理性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在知识领域——彻底主体化了，客观理性被根本排除了。康德和笛卡尔的主观理性观的共同缺点是没有解决先验主体性如何可能的问题。所以，海德格尔在说，“康德耽搁了一件大事：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而这耽搁又是由于康德继承了笛卡尔的存在论立场才一并造成的。”^{[5](p30)}

黑格尔试图在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将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统一起来。他从“实体即主体”的原理出发，使世界在客观精神（客观精神或绝对精神是人类精神的实体化）中得到同一。理性不光是人的主体能力，理性也“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6](p80)}而且他将辩证法理解为理性的本性，认为理性的能动性就体现为自我设定、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自由是理性的根本目的和原则，理性的辩证法使这一目的和原则在历史中展现。这样，黑格尔建立了近代唯一的一元的统一的理性体系。但是，一方面，他所重新发现的、被大多数人所遗忘的客观理性是自我意识的实体化，与古代的客观理性有了很大的差别；另一方面，黑格尔理性的辩证性是逻辑方法上的，就其整个体系而言，理性是绝对精神在历史领域的体现，它统治着世界和世界历史，人及人的活动只是理性得以显现的工具（理性的狡计）。归根结底，历史只是理性显现的条件，而不是理性的本质特征，历史从属于理性。也就是说，他所理解的客观理性仍然是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神秘存在。

西方近代理性观的突出贡献在于使理性从宇宙、神、上帝归依于人，人成为了自然和历史的主人。确实，理性只能是人的理性，根本不存在超越于人和历史之上的理智的能力，即客观理性。但是，一方面，这种理性观将理性仅仅理解为自我意识的能力，“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是一个“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7](p147)}也就是说，人们在抛弃客观理性，高扬人的主观理性的时候，却未能从客观理性那里批判地继承一些有益的东西（黑格尔则是一种回复）。其实，虽然不存在人之外的客观理性，但确实存在使人成为可能的，对我们来说是“规则”性的东西，这就是各种历史可能性的总和。人必须认识或领悟这种规则或处境才能存在并真正称得上是理性的人。古代理性观的谬误不在于认为人要认识和遵从法则，而在于把法则本身当成了理性，对宇宙作了拟人化的理解；近代理性观的不足不在于使“理性”祛魅而归人，而在于忽视了人的理性应有的客观性内容——领悟和注视自己存在的可能条件，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对“存在”的遗忘。这样，近代以来的主观理性如何对待客观理性仍然是个问题。而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矛盾也导致了主观理性内部的分裂。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哲学通过形而上学之后、黑格尔之后的流派向一种合理性理论集中”^{[8](p15)}，“合理性”（英文 *rationality*；德文 *rationalität*）的讨论基本代替了理性的讨论。这一转变与马克斯·韦伯是分不开的，韦伯对合理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理性与非理性都应当从功能上、行动和行动的效果上考察，而且他还最早明确区分了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韦伯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至少在逻辑全面性上改变了将（主观）理性仅仅理解为科学理性的看法，而加入了价值的维度。从实用的角度说，我们就不能将科学理性不发达的民族斥之为等而下之的非理性的民族；其次，正如德国哲学家赫·施奈德巴赫认为的那样，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理性的彻底非神秘化，理性从此再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实体、不变的规律和本质，而只能被理解为人的理智地存在的能力。^[9]

在韦伯看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注定要分裂、矛盾着的。事实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古希腊是统一的，因为那时人们理解的理性是道德和知识的基础，而且价值理性内部也是统一的。即使是到了西方近代史开端即文艺复兴时期，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也还是统一的。当时的理性不仅意味着崇尚科学知识和科学实验，也意味着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关怀。科学与人权并举；理性与人性和谐统一。

然而，近代科学的理论化和经验的实验操作化使得科学理性开始膨胀。胡塞尔就责怪伽利略通过“自然的数学化”的技术手段使科学世界替代了生活世界（*life world*），抽空了理性的价值、意义维度。作为近代理性主义的奠基人的笛卡尔将理性严格限制在科学（尤其是数学）的领域。从此，在其范式影响下，理性实际上逐渐被局限于科学认识论，进而褪为纯粹的知性方法，失去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性的人文价值之维。这是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滥觞。休谟对事实与价值进行了经典性的区分，认为事实判断的“是”与价值判断的“应该”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结果是以学科分裂的方式表明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康德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认为实践理性比理论理性更具有优先性。这种思想是极其宝贵的。但是，他认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都统一于纯粹理性，作为最高理性的纯粹理性的根据在于先验的主体性，它是主体的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康德的出发点是试图以纯粹理性统一科学和哲学，而当人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康德的理性时，往往忘记了他的形而上学目的和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将其理性哲学当成纯粹认识论的哲学。结果是加速了自笛卡尔以来的趋势，理性日益被局限于科学认识，并蜕化为一种纯粹的方法和工具。黑格尔的理性则既不能在现实的历史语境中理解自己，又“拒斥理性洞察事物的本质上的多样性”，而将自己强加于科学研究，与经验中构建的知识相

对立。所以，黑格尔的理性既是形而上学的，也是独断论的。

科学实证主义正是不满意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独断，依仗当时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对主观理性观进行了看似颠覆性的批判的。结果却是将理性彻底工具化了。科学实证主义认为通过追问“知识如何可能”的方式考察理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与实际经验无关，甚至背离。而科学实验和技术发明已经直接证明知识的可靠性、确定性，即理性的普遍有效性。所以，要证明理性，关键不在于认识，而在于找到科学的方法，理性就表现在科学的操作与论证过程中。但是，它达致的却是和主观理性异曲同工的结果：“从表面上看，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似乎是反近代主观理性概念的，但实际上它所肯定和宣扬的东西正是近代理性思想的一个必然结果。”^{[10](p298)}科学实证主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自笛卡尔（或伽利略）以来就孕育的近代主观理性的工具技术性发扬至极。工具技术理性的泛滥导致人类自身的生存困境，从而激起广泛的批判，这才真正是近代主观理性观的穷途末路。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今天是很时髦的，学说众多且各有前学之根据。溯其源头主要有四：一是倚重古希腊的客观（存在）理性资源；二是发挥马克思早年的“异化”思想；三是科学哲学的内部重建；四是继续叔本华、尼采以来的非理性主义传统。但是，现代西方批判工具理性的四种理路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好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问题。尤其是人们在关注价值理性时，往往为“迷人的多样性的内在共鸣”^{[3](p16)}所吸引，忽视了人类共同的、普遍性的客观依存关系。后现代主义的喧嚣则助长了这一价值相对主义的盛行。

（三）、普遍理性、完全理性与特殊理性、有限理性的矛盾

理性的普遍性和无限（完全）性是人们长期以来的信念。在古代，客观理性（宇宙理性、上帝理性）是超越的存在，它是个大全，世界万物无不受它的支配，普遍性和无限性就是它的本质特征。主观理性（人的理性）是客观理性的一部分，就人人皆有理性而言，人的理性也是普遍的；但相对于宇宙理性这个大全，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和特殊的。苏格拉底所谓“认识自己的无知”和中国老子所谓“知不知，尚矣”都从认识的角度说明人的理性的有限。但是，他们从人的认识理性的有限性出发，所希望达到的却是一种价值理性上的无限，即与无限、普遍的宇宙理性——善、道——的同一。

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人们虽然反对客观理性的存在，但对理性本身的普遍性和无限性仍深信不疑。认为理性是人人具有的，普世一致的精神能力。蒙田和笛卡尔的怀疑论恰恰是要证明人的理性的不可怀疑性、普遍性和无限性。康德受休谟的影响，认为人的认识只能把握现象世界，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但是，康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理性划定界限，反对形而上学。他的旨趣与后来维特根斯坦关于“可以言说”和“不可言说”的划分是一致的。事实上，康德仍认为，在现象和经验的世界中，人的理性就是无限的。而且，他认为纯粹理性是一种绝对、无条件的先验主体性，它既为自然立法，又为人自身立法。从这个角度看，康德的理性也是普遍和无限的。与康德同时代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自由市场经济原理的基本预设之一也是人的理性是无限的，他能掌握市场的全部信息，因而能自由作出理性的决策，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理性状态。黑格尔则恢复了世界理性，它支配着人和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它是普遍、无限的宇宙法则。

总的来说，从古代到近代，西方是将普遍性理解为理性的主要特征。在近代，又主要将理性理解为一种逻辑的推理能力。所以，他们的理性的普遍性就成为了逻辑推理能力的普遍性。这种理性观的“西方中心主义”造成了人类的许多灾难，也使理性的普遍性受到质疑。韦伯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其实就意味着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理性传统。正如一位非洲

学者恩格尔伯特·姆文 (Englert Mveng) 所说的那样, “除了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式的推理法和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之外, 通往真理的道路还有许多条。”^{[11](p60)}事实上, 进化是多线的, 历史是复数的。不仅是不同民族、地区的理性是特殊的, 就是不同的生活领域或学科领域的理性也是不同的, 例如经济学、哲学、美学、宗教等领域。麦金太尔进一步研究指出, 西方历史上关于理性或合理性的探讨本身就有各有区别的四大传统。所以, 当我们在探讨理性问题时, 不仅要问什么是理性, 而且要问“何种(合)理性”。其实, 整个冲突的“理性”史就从纵向的方面表明了理性的特殊性。有学者甚至认为“理性的特殊性比普遍性更根本”, 理性的普遍性“往往只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12](p120)}

在理性的普遍性受到质疑时, 理性在认识论、知识论层次的无限性、完全性也开始动摇。感性的事实是, 人们发现, 尽管科学技术已经极大发展, 但是世界和人类自身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和不可控制的灾变, 人类知识的增加反而意味着无知范围的增大, 人反而更加感到自己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支配。罗素的类型理论、歌德尔的不完全定理、塔斯基的真理论和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分别从逻辑学、语义学和物理学的角度揭示了人的认识理性的有限性。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独立地发现和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 认为在市场上的人由于种种原因, 他所得到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的, 他只能以自己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并非完全理性的决策。哈耶克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指出, 一定阶段的知识总和“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 有时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的,” “知识的分立特性……使个人对这种知识中的大部分知识必然处于无知的状态。”^{[13](p22、25)}因此, 现实存在的人的(认识)理性都是有限理性。

理性的特殊性和有限性的认识相对于形而上学之绝对理性而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 由于许多人片面、非历史地看待理性的特征, 理性的特殊性和有限性被极大地夸大, 甚至是成了理性的唯一特性。库恩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认为, 持不同范式的科学家处在不同的世界中。费耶阿本德直接指出, 不同范式、文化之间是“不可公度”的, 也就是说, 特殊理性之间不可能相互理解并在其之上寻找共同的东西。这种相对主义在后现代那发展为“差异(difference)”拜物教, “理性屈服于一种差异的狂热表演和多元的泛滥”,^{[2](p7)}普遍性的理性成为必须主动解构的对象。同时, 关于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的考察最终也是导致了一种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 与反对普遍理性异曲同工。例如, 哈耶克认为, 既然人人理性都是有限的, 都不能掌握完全的理性, 所以(包括政府、政党)也不能宣称自己掌握了无限理性以代替别人作出选择、设计社会发展的蓝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才是自由的。他还攻击社会主义的理性理念是“不幸的自负”, 是“通往奴役之路”。

那么, 是否特殊理性、有限理性, 甚或罢黜理性就是人类进步之正确解呢? 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全球文化冲突和全球化的趋势, 许多人们都和埃德加·莫兰一样认为: 一方面, 我们确实要摆脱那种形而上学的、“肤浅的”、“实际服务于抽象的合理化”的普遍性; 另一方面, 人类目前的迫切任务是“通过人类的多样性来揭示人类的统一性、人类的特性和人类的共相”。也就是说, 我们要达到的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14](p52-53)}但这又是如何可能呢? 理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需要一个统一的基点。

(四)、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对立

在理性告别宇宙、上帝、神而归于人以后, 关于人的理性的争论还包含着一种理性形成的方法论上的对立, 即演进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ty)观与建构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观的对立。这一对立的明确提出者是哈耶克, 而其渊源可溯及近代哲学中所谓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对立(经验主义也是一种理性主义)。

被哈耶克引为“同志”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认为，科学研究并不是一个理性可以证实的活动，而是各种假设不断竞争以求生存的认识过程。当他把这种思想运用于社会领域时，就开始批判一切理性设计的社会主张。这与哈耶克的理路是不谋而合的，哈耶克因此特意把他和波普尔的理性称之为演进理性，与他们共同反对的所谓建构理性观对立。在他们眼里，建构理性观就是唯理主义的理性观，认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对社会和世界进行大规模的设计与改造。被他们划入建构理性观清单的哲学家主要有笛卡尔、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凯恩斯等。哈耶克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他的演进理性观。首先，他认为演进是历史的事实。他认为人类社会在三个层次上都是演进的：物种的演进、文化的演进和心智的演进。^[15]这些演进都是生物体或人积极寻找机会、适应环境不确定性，通过长期的竞争而形成的。是一个无意识自发秩序的结果，而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其次，他认为理性的建构是没有必要的。哈耶克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秩序说，认为只要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看不见的手”将自然而然地使整个社会达致理性的状态，根本用不着理性的建构。再次，他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了建构理性是不可能的。哈耶克认为知识是以分立的状态存在的，因而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理性，谁也不可能全知全能地了解整个知识、信息。社会进化也就不可能为理性所控制和设计。建构理性只是一种自负，建构理性不仅不是人类理想的福音所在，而且是人类奴役和灾难之源。正是基于演进的理性观，哈耶克特别强调经验、传统和习惯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人是理性是从传统和习惯学习“理性”的理性，而不是建构和创造“理性”的理性。

显然，演进理性观是击中了近代主观理性观，尤其是唯理主义独断论的要害。波普尔和哈耶克许多结论也是无可批驳的真知灼见。那么，是否建构理性就真如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完全错误呢？存在纯粹的演进理性吗？尤其是哈耶克的演进理性观有着鲜明的价值倾向性，他明确指出这种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正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分歧的根源：从演进理性观出发，必然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其所实施的经济形态是市场经济；而从建构理性观出发，合逻辑的意识形态的结果是专制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其所实施的经济形态是计划经济。这样，关于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争论就不纯粹是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关涉人类何去何从大局的现实问题。总之，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对立是一个急待回答的问题。

从整个“理性”史来看，“理性”是问题重重的，这些问题直接体现在理解和使用理性的冲突上。而关于理性理解与使用的冲突主要是围绕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普遍理性与特殊理性、无限理性与有限理性、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关系展开的。其中，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的冲突是最早出现的冲突，因此，对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关系的理解决定了其他关系的理解。渴求统一性以理智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人类需要理性的原始冲动和一贯的信念。人们在形而上学的理性观坍塌之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性”来重建统一的理性。但是，这些“理性”没有一个被表明不存在逻辑上或哲学上的困难，更没有其中一个能将它们协调起来。但是，这些探索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孕育着一种深层的理性观转变。这种深层理性观的转变就是将理性问题逐渐归结为人的生存的问题，从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实践活动——追问理性的起源、内涵与功能。

二、实践与实践理性观

在对近代理性观的批判中，各种学说虽然意趣迥然，甚至互相攻击，但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倾向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现代理性观首先要做的是使理性从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独断中回归人的实践生活，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研究理性必须归于实践，这已基本成为现代理性哲学研究的共识与主流。问题只在于人们对“实践”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因此才导致了理性理解的现代冲突。

（一）“实践”之辨析

“实践（praxis）”一词出于古希腊，最早是指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活的存在物的特征。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理解为以自身为目的的行为，主要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伦理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而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且是最高级的实践。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反对经院哲学时开始将实践理解为与理论对立的实验、经验（practice）。康德将实践理解为道德意志活动，而把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仅仅归结为理论认识的问题。黑格尔将实践理解为人与外在世界的积极关系和绝对精神得以实现的中介，它包括了生产-技术活动，但是他理解的实践纯粹是精神性的活动。后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流行，实践进一步被理解为与理论对立，并对理论进行运用和检验的经验活动。这种经验活动主要包括物质生产和科学实验。这样，实践被理解为针对外部世界的操作性的、追求客观性的物质活动，变成了纯粹的（科学）认识论范畴，失去了存在和伦理的意义。现代实践观的真正奠基人马克思虽然也强调物质性的生产是最根本的实践，但从来没有仅仅将实践理解为物质生产，而是将之理解为人的类的存在方式，是属于人的“总体性活动”（Gesamttätigkeit）。但是，在科学主义认识论流行的时代，人们不可避免地对马克思的“实践”作了简单化的理解，马克思的“实践”也长期仅仅被作为一个认识论的范畴。

现代理性观在归于实践的同时，也集中批判近代的“实践观”。当然，就如文艺复兴时期一样，古希腊是哲学家们恋恋不舍的家园，他们许多人，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对近代实践观的批判也是以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进行的。他们的基本倾向是反对实践与理论的对立，反对将实践归结为认识论，也反对将生产视为实践。认为这些都是造成近代以来人类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将实践理解为比科学、哲学、生产更原初的生活方式，它是主要关涉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活动。并从古希腊的逻格斯最初的“叙说”含义和柏拉图的对话“辩证法”得到启示，认为实践主要是主体间的交往和对话，语言既是实践得以实现的条件，也是实践的组成部分，话语实践是最根本的实践。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普遍性就来自语言的普遍性。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实践呢？我想我们一方面要回到现代实践论哲学的奠基人马克思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吸收和借鉴现代西方实践哲学的积极成果。

马克思一开始就对实践进行了存在论（本体论）的，而非认识论的理解，他认为实践是人作为生命体的特征，是人的类本质，人实践故人在。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强调生产劳动的重要性，这是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所攻击的。但是，应该说，他们，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都误解了他。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过程来看，它既是一个创造性的生产（狭义的生产）过程，也是一个消费的过程，而马克思强调人的出场首先是消费——必须吃、穿、住、行。广义的消费就是日常生活的活动。它是历史的世俗基础。从生产的横向构成来看，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性活动不光包括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而且还有精神生产。并且，他还指出，交往是重要的实践，语言是一种“纠缠”着精神的物质，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6] (p25)}。马克思的实践是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关于实践的对立其实就是实践与理论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既是现实的、经验到的活动，也是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活动，更是创造性的活动。实践的理论性和经验性决定了实践的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双重品格。同时，在实践中，人“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7] (p53-54)}因此，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检验标准，也是人的价值、意义的确证。所以，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是涵义极广的，它是人的总体性的生命活动。

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论述奠定了现代实践观的基础，但是，一方面，马克思的后继者和批判者对它的理论进行了简单化的理解，因此需要一种返本式的澄清；另一方面，时代的发展使人类实践具有了马克思那个时代无法预见的新特点，因此更需要着眼于当代现实的开新式发展。

在国内，随着 80-年代以来的价值学、人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实践的理解已经逐渐超越了认识论的界限。但是，依然存在着局限，那就是过多地关注最发达形态的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忽视了实践本身在历史和现实中体现出来的异质性和复杂性。事实上，无论是从历时性角度看，还是从共时性角度来看，人的活动除了自由自觉、创造性的活动之外，总是存在着初级的、自在自发的实践活动。它是“由重复性思维、传统习惯、给定的图式和规则而自发地维系的活动，是一种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地进行的重复性实践活动”，它是“有组织的和大规模的社会活动以及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类本质活动（精神生产）之外的纯粹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领域，主要以个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男女、言谈交往等为主要内涵。”^{[18](p125)}它就是胡塞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世界。马克思早就明确了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生活首先就表现为衣、食、住以及其他活动。尽管它代表着人的全部生命活动中最近于自然和动物的部分，但它毕竟具有属人的特征。而且许多在一定阶段看来是自在自发的实践活动往往是以往自由自觉、创造性活动经过周而复始的重复而“日常”化的结果。所以，人的日常活动也是人的实践的重要部分。

交往实践是马克思实践观的重要之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是交往的系统质，人交往故人在。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交往的发展是人发展程度的标志。无疑，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必须工具，语言交往（对话）也是重要的交往形式。特别是在一个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人们的交往更为普遍、深入的同时，交往的方式逐渐数字化、虚拟化，语言、符号在实践中的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但是，我们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那样认为语言比物质生产更根本，更反对将生产排除在实践之外的做法。因为，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语言、符号也是在生产、交往实践中产生的，生产实践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将来也一定是最基本的实践。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方面，生产虽然永远是最基本的实践，但生产的方式是变化、发展的。传统理解的生产的对象和产品都是物质形态的，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时代，知识产业或信息产业的兴起意味着生产的对象和产品转变为主要是知识、信息形态的了。另一方面，语言、符号一经产生以后，它本身的运用——对话（**dialogue**、**discourse**）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践。它不光是观念的外壳，而且是人的存在性活动。人们不光是通过语言、符号解释和理解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话语实践中创造和建构世界与未来。而且，这种话语实践不纯粹是认识和生产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绝对命令，规范着人的现实与未来。^{[19](p70)}

与前述理解相关的是，立足于当代现实，我们要突出强调实践是能动性⁽¹⁾与受动性的统一⁽²⁾的特性。⁽³⁾马克思的实践观优越于一切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并不体现在他认为实践是能动的活动——因为这恰恰是唯心主义的强项，而体现在的马克思强调实践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这种受动性既表现为自然肉体的制约性，也表现为社会历史条件和规律的制约性。它是人类存在的前提。⁽²⁾片面强调实践的能动性，忽视实践的受动性恰恰是近现代人类困境形成的根源。我们应该认识到，随着人类的发展，虽然有些受动性的东西被克服了，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受动性与能动性是“俱分进化”的，能动性的增长必然意味着一种新的受动性的增加。⁽³⁾强调人的实践的受动性并不意味着贬低人和人的实践。受动性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共性，但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受动性，而且只有人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正确认识这种受动性。“按人的方式

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7](p81)}，正确认识自己的受动性恰恰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所以，所谓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必然是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受动性的活动，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自觉和有意识。(4)实践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是实践最基础和原始的辩证特性，实践的其它辩证特性，如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手段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等等的统一都只有在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

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实践概念。实践事实上就是指关涉人的存在与发展的一切现实生命活动。首先，人的实践是一种总体性的活动，是人的生命存在、认识活动和价值活动的统一。经验活动和认识活动只能看成实践的环节或内涵，而不是相反；实践既包括自由自觉的、高级的、理想的、活动的，也包括自在自发的、初级的、日常的活动；物质生产无疑是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实践，但交往实践和话语实践也是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辩证性的活动。它是意识与感性、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手段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而最为基础的是它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二)“理性”问题的实践解答

从实践的观点看，理性既不是外在给予的或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更不是主观自生的。它作为人的特性就如人的本质一样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开放地生成着的。实践的开放性和生成性就决定了理性的开放性和生成性。当然，实践之为实践，而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本能冲动，就在于它本身总是受一定理性的支配的。但这种支配实践的理性决不是某种神秘的超历史的先天理性，在一定时期内看似先天的理性恰恰是在以往人类实践活动中生成与积淀的。从理性的起源可以看出，理性和实践是互为条件和互为特征的。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实践产生和决定着理性，实践的特性决定着理性的特性。“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与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17](p83-84)}关于“理性”的种种争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答。

首先，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理性必然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实践的受动性表明，人总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种界限、前提和条件对人来说表现为某种规律或规则性的东西。人的生存只有关注这种规律或规则才成为可能。那么，人作为理性的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之重要一点就在于能认识和体悟到这种存在的条件和规律——它是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同合法性源泉：工具理性必须认识世界的规律，价值理性必须体悟存在的规范。也就是说理性必须有客观性的维度。但由于理性本身是人的一种实践能力，所以，理性的客观性不能理解为“自在的客观性”，而是一种“自为的客观性”和“主体间的客观性”，即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客观性。作为人的存在的制约性条件的东西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被揭示或表现出来。而且，这些东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在人的实践中不断生成、变化着的，概而言之，它是使我们存在成为可能的历史的全部可能性的总和。同时，一方面，理性作为自为的客观性、主体间的客观性也就必然寓含着人的目的和价值诉求；另一方面，任何时代的人们都不会满足于客观性的制约，而是有所主动的创造，这种创造正是实践的能动性本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理性又具有主观性的一面。理性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正像实践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一样，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

其次，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理性必然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目的性是理性的根本特性之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实都是一种目的理性，区别只在于：工具理性所旨归的目的是短期的、直接的和往往是功利的；而价值理性所诉求的目的是长远的、终极的和往往是精神的。

这两种目的对人的存在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分割开来的。人为了存在和更好地存在（发展）就必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只有当运用他的理性并与他的同伴合作，致力于为人类需求的技术供给建立秩序时才能生活。”^{[20](p30)}所以，追求工具（技术）理性并没有什么不对，相反，它恰恰是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但是，工具理性不是理性的全部，它本身还存在着合理性的问题，它的合理性必须在人的存在层面加以审查，人的这种能力就是价值理性。实践是人的存在、认识活动与价值活动的统一，所以，从实践的角度看，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理性是认识论（指真正的认识论，即理性的认识论）的主题，是关于真正的价值（指作为理性的价值的真正的价值）学说的主题，是关于伦理行为（指真正的善的行为，即从实践理性出发的行为）的学说的主题。”^{[21](p9)}

再次，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理性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人的理性必须关注存在，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人的类本质就是其实践的存在方式本身，实践的类特点和存在特点既决定了理性的客观性，也决定了理性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对具体的个人而言，是现实的和先在的，而不是思维自生的。但是，它和理性的客观性一样（或者说理性的普遍性只是理性客观性的另一种表述），不是超人的和永恒不变的普遍性，它是在人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并随人们的实践发展而变化的具体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是指工具理性的，也是指价值理性的。不同的民族、地区的价值理性是不同的，但这种不同只能被理解为基于不同实践水平和样式的不同的历史视界，即在各自具体历史条件下以不同角度与方式对人的存在、发展这一“类”的问题的关注。如前所述，对人的实践性存在的关注是价值理性的合法性源泉，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说各种价值理性是无所谓优劣的，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倡导价值的多元化。如果在倡导多元时忘却了这种基础（后现代等价值相对主义正是这样），认为不同的价值诉求天然合理的话，人们将面对“纳粹”难题，人类将面临危机。所以，实践作为存在方式的普遍性和实践具体样式的多样性就决定了理性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同时，理性关注存在而来的超越的普遍性也就说明理性在这种意义上具有了绝对性或无限性。当然，人们更多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谈理性的无限性与有限性。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实践的不确定性就决定了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关于世界最后的完整认识。相对而言，人们对世界的每一阶段的认识和以往所有认识的累积从根本上都是片面的和有限的，这就是理性的有限性。现实的理性都是有限理性。但是，一方面，实践的确定性也决定了理性的绝对之维，绝对性与有限性是理性同时具有的两方面特征，绝对理性（无限理性）与有限理性不能机械地分开；另一方面，人们从不满足于有限理性，而总是试图通过有限的理性把握无限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人的思维是非至上性与至上性的统一，从可能性和趋势上看，理性的发展是开放的，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的。理性的这种追求绝对性的理想之维和现实的有限性之维都是真实的，它们统一于人们的实践活动。

最后，实践的特性决定了理性是演进与建构的统一。实践是能动性受动性的统一，它既包括自由自觉的高级活动，也包括自生自发的初级活动。从实践的角度看，“建构理性”强调了理性自由自觉的能动性方面；而“演进理性”强调了理性的自生自发的受动方面。两者都是片面的。其实，社会和理性的发展从宏观上看，它确实是呈现出演进的特征。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所内在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马克思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社会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人的发展不同于一般生物的进化就在于，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社会历史是由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创造的。制度、传统和习惯等等看似演进的东西无不包含着人们在实践中共同的发明与设计。事实上，就人类而言，离开演进不可能有建构，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

离开建构也不可能有演进，因为演进只不过表现为人们理性建构的合力与积累。至于理性的有限性与完全性的问题，它们对于演进和建构的证明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理性的有限性与完全性的统一也决定了理性的演进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可见，理性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又指导人的实践活动，理性自身的合法性在于实践的有效性；实践的基本形态决定着理性的基本形态，实践的辩证品格决定了理性的辩证品格，实践与理性是原始统一的；理性的内在矛盾由实践决定，在实践中展开，也只有在实践中得到解决；理性是主观性与客观性、工具性与价值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完全性与有限性、演进性与建构性的统一。对理性作如是观，我们称之为实践理性观。它在彻底结束了客观理性观和主观理性观的共同的形而上学性、抽象性与各自的片面性的同时，以辩证的方式保留了它们的积极成果，使“理性”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同时，由于我们对实践作了总体性的理解，我们的实践理性也就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了，它既是一种基础的理性，也是理性的总体，体现了理性本身的统一。

这样，实践理性观理解的“理性”是：一、它是人的一种总体性的实践能力。这里又包含了三层意思：（1）理性是人的理性，不存在人之外的理性；（2）理性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实体性的，理性是人的一种能力；（3）理性作为人的能力，远不止认识能力，而是总体性的实践能力。二、理性是在总体性的实践中生成的一种能力。这表明，理性并不是天赋和先验的，也不是永恒、均质地存在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生成、建构起来的。三、这种能力集中体现为处理实践的能动性_与受动性统一问题的能力。从实践和理性的历史效果来看，它表现为理性的目的性和规则性。理性不外是为了人的存在与更好地存在（发展），这就是理性的（价值）目的性。它是由实践的能动性决定的，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实践的受动性则决定了理性的规则性。当然，一再强调，这种规则是一种“自为、主体间的客观性”，是一种在历史和实践_中显现、生成、变化的准则与规范。理性的规则性特征与目的性特征是不可分割的特征，规则为目的的服务，目的只有通过规则才能实现，它们共同的源泉与基点就是人的实践性存在本身。当然，在现实中，既合规则，又合目的的状态是很难达到的，不同的文化（实践）环境下产生的理性所侧重的也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说明人没有追求这种状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人的理性。所以，虽然我们给不出理性的完整定义，也不可能穷尽理性的全部含义，但我们仍然有必要而且能够给理性一个宽泛而开放的描述：**理性是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试图且可能使自己的行动既合乎规则又合乎目的的能力。**它是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行为方式意义上的“理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 [1]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 后现代理论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2] Calvin O.Schrag, *The Resources of Rationality*[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 伽达默尔. 科学时代的理性[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 [4] H·P·里克曼. 理性的探险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5]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 [6] 黑格尔. 小逻辑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7] 恩格斯. 反杜林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0.
- [8]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 第1卷.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 [9] 赫·施奈德巴赫. 作为合理性之理论的哲学 [A]. 德国哲学: 第7辑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10] 张汝伦. 历史与实践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华勒斯坦. 开放的社会科学 [C].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12] 韩震. 重建理性主义信念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 [13] 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 上册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14] 埃德加·莫兰、安娜·布里吉特·凯恩. 地球祖国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15] 汪丁丁. 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初论 [A]. 公共论丛: 第2卷 [J].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16] 马克思、恩格斯. 费尔巴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17]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18] 衣俊卿. 回归生活世界的哲学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19] 卡西尔. 人论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20] 卡尔·雅斯贝尔斯. 现时代的人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 [21] 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Practical Answers to the Problem of Rationality

SHEN Xiang-pi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understand and use the notion of rationality, there had always been the contradiction/controversy between subjective rationality and objective rationality, imple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bsolute rationality and limited rationality, evolutionary rationality and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 We can giv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of rationality in Marxist practical views: rationality brought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human practice, it is the ability to try and can accord the behavior with both the rules and the aims. It is the unity of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axiological meaning of rationality. It is also the unity of subjective rationality and objective rationality, imple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bsolute rationality and limited rationality, evolutionary rationality and 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

Key Words: Rationality; Practice; Question; Answer